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编者启事】		
【亡灵祭坛】	王冷之死	王友琴
【往事非烟】	我的劳改难友谭淮远	羊市大街
【乱世人生】	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下）	田炳信
【研究动态】	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	丁学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编者启事】

本刊未经作者授权在第九三二和第九三四期连载《视听暴力：“九评”的生产、传播及红卫兵一代的记忆》一文，并将作者孙沛东姓名误植为沈沛东。应作者要求，本刊决定撤去该文，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特此启事。

~~~~~

【亡灵祭坛】

王冷之死

• 王友琴 •

1966年夏天，西安第三十七中学的红卫兵学生打死了两名教员，打伤九名教职工，还有一人因此精神失常。

这个中学当时有900多名学生，没有高中，只有初中三个年级。这个中学在西安南郊，距离中共西北局很近。学生中有相当多“革命干部”子弟，当时成为红卫兵的主力。

王冷在西安第37中学教书多年。文革开始前，1966年2月，王冷已经被调到了西安第八中学。

1966年8月25日早上，第37中学的两个红卫兵到第八中学把王冷押走。到了第37中学以后，王冷就被关进该校关押“牛鬼蛇神”的监牢，在那里遭到红卫兵拳打脚踢。当天下午，王冷被押去“陪斗”一位姓张的教员。红卫兵让王冷双手执铁哑铃，深度弯腰。一个小时候后，王冷昏倒在地。去第八中学押王冷的那两名红卫兵之一，用木棒从后面抽打王冷。

8月28日夜里十点，王冷和20多名“牛鬼蛇神”被赶入“专政室”。红卫兵把课桌排成圆圈，把玻璃瓶打碎撒在桌子下面，逼迫“牛鬼蛇神”排成队，在桌子底下玻璃碴上爬行。这些人被折磨拷打直到天亮。王冷的头发被拔被撕又被剪光。

8月29日，王冷被“强迫劳改”十多个小时。

8月30日，继续拷打审讯。上午毒打两个多小时，下午又被毒打一个小时。王冷的眼睛被砸碎。王冷以前在履历表上填写的“家庭出身”一栏是“职员”。红卫兵强迫她承认是“资本家兼地主”家庭出身。

8月31日，在连续两天两夜的拷打和“强迫劳改”以后，专门组织了“斗争”王冷的大会。那是下午。王冷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被反剪双手押进“斗争会”场。台子上放了两张桌子，桌子上架了长条凳子。红卫兵命令王冷站在长条凳子上，低头弯腰。他们用扫帚打她。扫帚打飞了好几把。

“斗争会”上，有“控诉”，有高喊口号。红卫兵在王冷脖子上挂了一副铁哑铃，以后又加了一副。他们还在王冷站的凳子上再加一个凳子，命令她爬上去。王冷站在高凳子上，他们把凳子踹翻，又叫她把凳子架起来再爬上去，又把她打翻跌下来。几次反复，直到王冷昏死过去。

王冷昏迷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四个红卫兵把她扔起来往下摔。接着，他们把王冷拉到食堂厨房后面，在那里，用铁棍打，用砖头砸，还在她身上踩。一边打，一边骂：“狗日的，到现在还不老实。”王冷腰脊骨破裂，头颅右部破碎，鲜血从眼睛、耳朵和口中流出。这几个红卫兵又倒拎王冷的脚，把她头着地拖到四百米外的教学楼，王冷的鲜血跟着洒了一路。在教学楼里，他们又用冷水浸泡王冷。

王冷在9月2日死亡。王冷死的时候，头部肿得像个冬瓜一样。王冷的尸体很快被烧掉。

由第37中学的红卫兵开了火葬证明，全文如下：

王冷现年36岁，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在运动中极不老实，8月31日群众斗争，王冷死不交代其罪恶并当场放毒说什么：“蒋介石就是不该死”。态度生硬，要与人民对抗到底，群众激愤，被红五类子女当场打昏，送至医学院，抢救无效于9月2日身死。意见：火葬，葬费由死者亲属负担。尽快结束。

市37中红卫兵（借章）

证明信上盖的是西安市第37中学的公章，这就是“借章”的意思。

从这份证明，不但可以看到红卫兵如何看待王冷之死，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残酷的总体气氛。

和王冷一起在8月31日被“斗争”和毒打的有王伯恭老师，他在一天后死亡。王伯恭老师已经在1965年退休。他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军队的政治教官。抗战结束后退出军队从事教育工作。当时被红卫兵指控为“老反革命”。

王冷和王伯恭被打死后，该校“文革筹备委员会”主任多次警告“牛鬼蛇神”：“再不老实，王冷就是你们的下场。”

当时领导西安的文革运动的，是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他们没有出面制止暴行。中共西安市负责人徐步还指示到第37中学采访“经验”，予以报道。

积极参与毒打王冷的几个红卫兵，后来成为在9月初成立的“红色恐怖队”成员。那是西安中学生红卫兵的“精英分子”，成员多为高级干部的子女。“红色恐怖队”被简称为“红恐队”。这个名字和他们的行动，显示出他们不但实行暴力迫害，而且公开地以制造恐怖为荣。

半年以后，随着文革的发展和打击目标的扩大，这些红卫兵的“革命干部”父亲也被“打倒”。“红恐队”被解散。中共西安市负责人徐步后来也被“打倒”并且跳楼自杀。王冷的丈夫张孝曾经用这个机会揭露红卫兵打死王冷的残暴行为。有一些学生也为王冷之死鸣不平。他们所用的理由是：王冷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敢提王伯恭之死，虽然王伯恭和王冷在同时被打死。王伯恭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教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当时的普遍观念是：“有问题”的人被打死是应该的，至少是没有关系的。为王冷鸣不平的人只能在文革的通用观念范围内尽量做文章。

1990年代，这个中学有多次同学聚会。没有人为王冷和王伯恭之死道歉或者表示良心上的歉疚感。一名当年的学生现在的文化人说：王冷什么“问题”也没有，只是她对学生比较严格比较厉害。另外，她看起来自视甚高，烫头发，穿旗袍，人也长得漂亮。中国的文化里有非常邪恶的成分，在1966年表现为杀死王冷，在1990年表现为不忏悔。

中学生红卫兵大规模地殴打以及打死老师，最早起源于北京，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发展和“革命大串连”传播到全国各个学校。在北京，学生打死老师的高潮发生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在西安，杀戮掀起比北京晚了没有几天。这显然是文革领导人有效使用了现代通讯、交通以及宣传手段的结果。

关于王冷，笔者还亲身经历过一件与她有关的事情。1999年春天的一天，笔者下课以后，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遇到四位来学校游览的中国老人。他们请笔者在一个花坛前为他们照一个合影。四个人中，一对老夫妇是常住美国的老华侨，另一对老夫妇是受他们邀请从西安来美国游览的，其中之一是退休中学教师。彼此攀谈起来。笔者问起西安来的退休教师是否知道王冷被打死的事情。那位老太太说，知道，还知道王冷的丈夫叫张孝。这时候，她的丈夫把她拉到花坛的另一边，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他们立即跟我告辞离开了。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样子，笔者感到惶惑而压抑。他们在怕什么呢？杀死王冷的余威，或者说文革的余威，三十多年以后，远在美国，还让人如此清晰地感觉到。

#### ◇ 附录：关于王冷事件的二份资料

（一）王冷丈夫张孝的文章《为身遭残杀的王冷同志再控诉——要求惩办杀人凶手和幕后策划者》（收录在《王冷同志之死——看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向阳区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腥罪行》，1967年三月印制，无具名）中关于王冷死亡过程的摘录——

……王冷同志，原系西安市37中语文教员，1966年2月调为市8中语文教员。（1966年）8月25日，王冷同志回家告诉我：8中文革的负责人，转达市、区委决定，让她去37中参加文化大革命。她感到迟疑和恐慌，《十六条》里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对象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她只是一个职员出身，学生成分的普普通通的教师，为什么还非要她去37中不可呢？是不是因为她平时对同学要求太严太认真了呢？当时，37中的白色恐怖她是有所耳闻的，这更让她心里纳闷。当时王冷同志曾向他们提出她去37

中的安全问题和合不合十六条精神的问题。8中文革负责人回答说：37中也要按十六条办事，自然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谁知，这一切都是预谋妥了的，8月20日，她一进37中校门，就被关进了“牛鬼蛇神”的监牢。仅仅五天时间，就经历了无数次的拷打和折磨，终于在（8月）31日，被摔、被打、被踩、被杂的遍体鳞伤。昏迷过去，不醒人事，虽经西医一院多方抢救，仍于9月2日凌晨死去。

……经过37中革命师生和商业学校革命同志的揭发，我才知道王冷同志受迫害身遭残杀的情况和经过。8月25日一早，37中来两两个“学生”白解放（保字号红卫兵、四不清干部之子）和吕水牛，把王冷从8中押到37中，一进校门就立即被送入“牛鬼蛇神”监牢，并遭到白解放的拳打脚踢。下午又被押去当陪斗（当时在斗另一教师张××）。他们让王冷同志双手各执铁哑铃，深度弯腰。一个多小时后，她昏跪在地，白解放就用木棒从后抽打。就这样，开始了残害王冷同志的序幕。

“8·28”夜，十时许，王冷和20个多“牛鬼蛇神”，被赶入了“专政”行凶室。在布满玻璃渣的水泥地面上爬行，转桌框，遍遭毒打达四个多小时之久，接着又被拷问折磨到天亮。这次，连她的头发也被拔被推后再刮个尽光，29日还被迫劳动十多个小时。

8月30日，继续拷打审讯，上午毒打达两个多小时后，下午又毒打一个多小时，把她的眼镜也砸断四处，他们强逼王冷同志承认是资本家兼地主出身。

在连续两天两夜的拷打、强迫带伤劳动之后，8月31日又专门组织了斗争王冷的大会。他们给王冷同志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脖子上吊着十多斤重的铁哑铃，把她反剪双手，押入刑场。“斗争和诉苦”的大会开始了，主席是白解放、吕水牛、罗建立（军干子弟，总字342部队某部部长罗昌福之子），在讲台上垒叠着两张课桌和两条长凳，最上的长凳反放着下面是立放的砖头，他们令打手鞭打王冷爬上最高处要她站在反放长凳的横梁上去交代问题，当她刚站上去站立好，只说了一句话：“同学们，今天我交代…”白解放就宣布：“剥夺王冷的发言权。”凶手们故意晃凳子，让王冷同志摔下来。就这样，在皮鞭不断的抽打下，让她一次一次的爬上去，一次一次的向下摔，几次昏死过去，摔的不成人形。当王冷同志实在无法再上去的时候，白解放又一边喊：“打”，一边拳打脚踢，并且挥动皮带劈头盖脸而来。如此在礼堂内外拉出拉进直打的王冷同志遍体鳞伤，昏迷不醒，不省人事，这时，他们反说王冷装死了，于是由罗建新、刘德成、陈松林（保字号红卫兵）、×××四人把王冷扔起来向下摔，人已气息奄奄，危在旦夕，但凶手仍没有就此住手。他们又将王冷拉到灶房后边一个角落的炭渣上，轮换用铁棍打她的腰部臀部，使铁棍都几度打弯了再打直。罗建新同时踢她的头，踩她的肋骨，使王冷同志哼了一声，这凶手又去踢她的下身，再站到王冷同志身上去踩踏。又一凶手用脚将王冷同志拨来拨去说“狗日的，资本家到现在还不老实”。白解放又拿起砖头去砸她的头颅。王冷同志被这几个凶手采用暴行后，已是头颅右部破碎，脑浆串入眼球，腰脊骨裂碎，鲜血从眼从耳从口中外流，这几个凶手又倒来上王冷同志，头着地的拖上了四百米外的教学楼，王冷同志的鲜血跟着洒了一路。凶手在楼上又采用暴行将王冷同志用冷水浸泡，

……明明是摔、打、砸把王冷同志折磨的奄奄一息了，但他们为了掩盖罪行，却硬说是“急性心脏病”。医院来的医生“急救”时，他们百般阻挠，不许治疗，说“王冷是装死的”“死了不如一条猪”等，后来是在医生、护士强烈提出说：“病人马上要死亡，死亡了你们要负责任”后，他们才勉强准许送医院抢救，以开脱杀人罪责。抢救无效后，他们又造谣说王冷是畏罪自杀的。

## （二）致王友琴的信（摘录）

关于您在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我就我所知道的（或有资料证实），现回答您：

……王冷有两个孩子，年龄稍大的是女儿，叫张晔（又名王琴）；年龄稍小点的是儿子，叫张新。1966年，张晔（王琴）13岁，是西安市32中初一的学生，张新当时8岁。当时虐待王冷的凶手，白解放现在还活着，68年前后因王冷事件被监禁，75年前后被释放，现在是西安市辛家坡村村民；罗建新（罗建立的弟弟）也因王冷事件被监禁，同白解放先后被释放，出狱后曾经在碑林区政府当通信员；陈松林文革中下乡，返城后在火车上餐车厨师。王冷、王伯恭的材料是当时37中党委书记崔鹏未了保护自己在运动中不受冲击而抛出来的，王伯恭曾经在黄埔军校上学，与徐向前是同班同学，作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教官，抗战结束后脱离国民党军队转而从事教育工作。1966年8月31日被37中学在校学生“8·31”批斗大会上虐打致死。关于王冷死亡的背景原因，现印述《王冷同志之死——看西北局、陕西省委、西安市委、向阳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王冷丈夫张孝写的《为身遭残杀的王冷同志再控诉——要求惩办杀人凶手和幕后策划者》一文的相关部分予以说明：

……（8月31日）正当凶手最后残害王冷同志时，商校的工人、炊事员、学生在墙上目睹了他们的暴行，并提出愤怒的抗议。但37中筹委会的负责人杀害王冷同志的凶手之一罗建立却站出来大骂对方，并说：“我们红五类，就是要打黑七类。”“这种人打死了就活该”，他还在先天晚上给白解放布置说：“明天斗争时，打了就不要挡，打成啥样子就是啥样子。”这是个什么样的“斗争会”呀？不是，这简直是一个毛骨悚然的惨绝人寰的杀人刑场，这是西北局、省、市、区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37中革干子弟筹委会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一个白色恐怖的“样板”。在37中，筹委会主任郭兰生（西北局粮食局副局长郭立功之子）曾多次警告所谓的“牛鬼蛇神”说：“再不老实，王冷就是你们的下场。”在46中保字号红卫兵实行白色恐怖时也警告“牛鬼蛇神”说要不规矩，就是王冷的下场。而以徐步（西安市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为首的《西安晚报》工作队竟派出记者去现场采访，要在37中搞出个“斗争与诉苦相结合”的典型经验拉，他说：你们今天这种斗争和诉苦相结合的形式很好，要很好总结出经验拉。又策划说：只写经验，打人的事不要写，三番两次要37中写出材料进行报道。同时，刘澜涛的“红卫兵司令部”所属20中学“欧战红”领导人钱霜天（西北局文艺处处长之子）也来现场并登台讲话，说这会开的很好，让的安家都学会打架，高号“自来红万岁！”就是这个血腥经验，已经在一些中学里传开了，起着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天琦（西安市委第一书记）、徐步、卢辉（向阳区委书记）们要它起的作用。

……杀死王冷同志后，凶手们怕承担责任，到西北局和区委请示办法。西北局接待员×××说：牛鬼蛇神，死了就算了。向阳区委文革办公室主任吴秀丽就说：“不能因此事影响学生的革命热情。”向阳区委书记芦辉的干将、区委联络员办公室负责人王璞斌，在一次区团委会上听到有人问：37中打死了王冷…而他竟然说：“打死人，看是打死什么人！”又说：“打死的没有好人。”

……王冷同志死亡后，惨遭杀害的真相不明，在9月2日，我们同意他们的决定，由西北局、省、市、区委、市教师进修学院、8中、37中、医院、死者家属（张孝）共同座谈王冷致死的有关问题，我也要求澄清一下王冷同志的有关问题，而他们自食其言，不但不开会，反而由王森记（区委联络员）出面对我进行威胁说：你要和王冷划清界限，“牛鬼蛇神”还能谈啥；并说：不要阻碍文化大革命。进院×××也在一旁帮腔说：算了，先把人埋了，王冷的问题，是啥性质，最后组织上会做出决定。

……王冷同志被害的那天，我给（教师进修学院）院党支部书记、行政领导、文革负责人夏少耕去汇报王冷同志的遭遇，由于悲愤，我抑制不住的哭了。夏就瞪着眼，板起严厉的面孔说：“哭什么！你要和王冷划清界限！还要揭发王冷的问题嘛！”

□ 摘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

【往事非烟】

我的劳改难友谭淮远

• 羊市大街 •

1968年7月，军宣队（全称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终止了两派分区而治，互不来往的局面，北京高校进入了毛泽东指示的“清理阶级队伍”，“斗，批，改”阶段。军队是要杀敌立功的，没有战争，就要从人民内部挖出“暗藏的阶级敌人”消灭了才能立功。1968年，北京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部门被军宣队迫害致死的教授，研究员，远远超过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害死的。北大文革初期死了两个教授，御林军8341进驻北大清理阶级队伍迫害死了24名教授。1970年军队接管公检法，第一件事就是“镇压反革命”，全国枪毙“反革命分子”十三万人，基本都是善于思考，勇于发声的爱国知识分子。

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当然不会放过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我的罪名有三：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搞个人迷信。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大国沙文主义。三，1965年2月北京市召开抗美援朝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人揭发我在金水桥上说，“我要有支枪就好了”。（我没说过，死不承认）军宣队最拿手的就是镇压反革命，一进校就把我列为打击对象，新帐老帐一块算，对我实行群众专政。由贫农出身的班领导对我宣读勒令，要我低头认罪，老实交代，交出全部日记和书籍。召开班级批判会，每天交一份检查（这些检查在1980年全部退还给我了，保存至今）。1968年12月，我们这一届全部分配完毕，只留下几个挨过批斗的不予分配，其实就是军宣队为自己留面子。如果把我分配了，就等于说他们整错人了。公开的理由是留在六九届参加“斗，批，改”。而且我一分配，工资就46块，比工作20年的三级工还高，出于嫉妒，他们也不想让我逮这个便宜。

五系六八届一共留下五个人，其中一个是谭震林的儿子谭淮远，老红卫兵司令。他老爹在台上时，他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爸爸被打倒了，他就成了“老子反动儿混蛋”。再加上此人什么都不吝，不把军宣队放眼里，怪话多，也给关了进来。一个是个军队子弟，叫章盾之，文革初期是老红卫兵政委，破四旧神气的很。他知道很多内部消息，散布不少反对林彪言论，被打成反革命。他是我们之中唯一在全系批斗会上被押上台的，而且不予分配，下放内蒙插队。最后一个叫王作强，出身于北京工人家庭的红卫兵，运动初期京工的红卫兵在北京抄家出了名，被中央文革派到上海抄家。他抄出资本家的金元宝后见财起意，装在裤兜里。没想到裤子太破，兜里有个洞，元宝掉出来了，给中央文革丢了脸，也被劳改。他自持出身好，是经济问题，总要表现的比我们这些政治犯优越。

六八届都离校后，我们五个就集中在一间寝室里，每天起来面对毛主席像认罪，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对着毛主席像，念毛主席语录）。白天在系里的菜地掏粪种菜，晚上不许出门，离校要请假。2012年以前，北京西三环从魏公村路到西，北三环拐角处，有大片绿地，那里是五系雷达场，当年我们的菜地。北京西三环尺土寸金，那片地居然一直绿到2012年。因为五十年代那里曾经存放过放射性物质，北京市没人敢批准盖楼。然而李源潮把南航校长调来当北理工校长，北京被郭金龙一帮江苏帮控制，批准在有放射性残留的地皮盖楼。

我和谭淮远虽然同系同届，却不同班，他原来比我高一级，因病休学一年。以前从来没什么来往。第一次在公共场合看见他是8月18号晚上，他带领本校的红卫兵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见面后，回校代表红卫兵向全校师生汇报的欢迎会上。当天我也在天安门前担任标兵，就是用人把广场分成十条通道，每十米站一个人，群众游行队伍分成十列纵队，从这些通道穿过，防止有人越过标兵线涌向天安门，造成拥堵混乱。从建国以后，标兵一直由我校师生担任，北京市民学生年年游行，训练有素，标兵线只不过是路标，从来没发生过游行队伍越线的事。然而外地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时就全乱了套。毛主席一露面，广场上所有的人一起涌向金水桥，走过去的往回返，没进来的往前挤，检阅后光鞋就运走好几卡车。

毛主席检阅游行时，有时候会离开城楼，或者休息，或者会见一些人。观礼台上的红卫兵看不见毛主席，就会挥动语录高呼：“刘主席，我们想见毛主席”。可是晚上谭淮远带队汇报时，只说“我们想见毛主席”。加上新闻报道中，刘少奇排名从第二降到第八，我都感觉中央可能有什么变动了。当游行队伍走过我面前，碰巧毛主席不在主席台，有些人就会问，毛主席在哪。我回答了一句：“毛主席下台休息了”。碰巧被10米外的另一个同学听见，就又成了我一条“恶毒攻击”罪状：“要毛主席下台”（别笑，这事在外地可能就是死罪）。

从那以后，我和谭淮远在一间宿舍住，接触机会多了，对这个阶层的人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候，六级部长级以上才算真正的高干，有专车（一般是吉姆牌）不像现在，当个县长就觉得自己是土皇上。那时候的高干子弟大多学军工，集中在我们学校和哈军工，以研制新武器，保卫国家安全为己任。不像现在的官二代，整天就想发财，玩女人。我们学校的校友早期的有李鹏，叶选平，我入校那年曾庆红刚毕业。谭淮远算是级别最高的高干子弟，还有邱会作儿子邱路光，煤炭部长张霖之的女儿，国防科委赵尔路中将的女儿，省部级干部的孩子连名字都排不上。赵紫阳的儿子赵大军在北京那些高干子女眼里就是个不入流的小混混。

谭淮远最大的特点是随和，没架子，和谁都是嘻嘻哈哈的，侃起来云山雾罩。而且出言幽默，毫无忌讳。他说，日本战俘说共产党好，优待俘虏。八路“太大地坏，拼刺刀铁炮地给（开枪）”。他身体不好，但干活总挑最脏最累的。掏粪时，他把粪桶从粪坑里提上来倒入粪车，粪汤溅在身上也不躲，如果粪桶里有砖头什么的，他伸手就拿出来。拉粪车他总是架辕，我在一边拉。如果挖开一个新化粪池，他会兴奋见人就大声嚷嚷，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不过那年头劳动光荣，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

高校的“斗，批，改”，就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改造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后面，行九，简称臭老九。不过当毛泽东重复了样板戏坐山雕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知识分子的日子就好过点了。为了改造臭老九，工宣队的一个头头整天给我们做报告，又臭又拽。每逢开会，谭淮远带个小马扎一坐，就开始织毛衣。这家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学来的本事，毛衣织的相当有水平，还有一套一套的经验介绍。一个大男人，留着胡子，歪戴帽子，叼根烟卷，专心致致在那里织毛衣，谁还听报告啊，全场注意力都被他吸引了，工宣队头头干生气没辙。全场的女人都织，总不能只管他一个吧，可是女人织毛衣谁在乎啊。谭淮远织毛衣，是那个时代我们最开心的小品。

从谭淮远抽烟，就可以看出他的经济状况。刚住在一起的时候，他抽中华，6毛一包，然后牡丹，5毛一包，后来改群英，4毛7，然后是大前门，3毛6，，飞马，3毛。最后是没牌子的白皮烟，9分一包。最惨的时候是把平时留下的烟头剥开，用烟斗抽里面的烟丝。然而他很坦然，经常带一盒烟头去开会，当大家面剥出烟丝抽烟斗，我猜他是故意的。无论吃，

穿，烟卷，他是有什么算什么，我从来没听他抱怨过。我试着用他烟头里的烟丝卷烟抽，难抽极了，可从来没听他说白皮烟不好抽。

他从不炫耀自己的生活水平，但是经常谈一些烹饪技巧和方法。那年头，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也只有他有研究厨艺的条件，他父亲有特供，家里有厨师。他不仅会欣赏美食，也跟厨师学习烹饪。估计现在家里有厨师的高官子女，只会挑剔口味，没有人会下厨当学徒。谭淮远不光会动手烹饪，还有理论。他有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做鱼一定要放酒和醋。酒是乙醇，醋是乙酸，一起加热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乙酸乙酯，是一种芳香醇，所以特别香。炼猪油要放水。他还拿来菜谱给我抄，我的烹调兴趣就那时候开始的。此外，他还拿来王力的《诗词格律》，胡乔木诗选给我抄。有一次军宣队的一个小兵来给我们训话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很快要去莫斯科支左了（莫斯科他发音“马死扩”，不知道哪里的乡下土话），谭怀远听了一脸严肃地一声不吭。

虽然我和谭淮远在意见宿舍住了8，9个月，但交往并不多，但他帮过我一个大忙。我在新疆串联时认识一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新疆军区文工团的钢琴演员，我从新疆回来后一直和她保持联系。我被打成反革命后，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处境，我说，你是军人，和我这样的人来往会给你政治上添麻烦，以后别给我来信了。没想到她给我回了信，说她相信我是清白的，是值得信任的，她愿意继续和我保持联系。她这封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带来的关怀的温暖，和坚持下去的勇气，让我终身难忘。1969年初，她回北京探亲时给我来信，希望我去她家做客。

可是，对我来说，进城看她谈何容易，来回车票4毛，而我一天的饭钱才5毛，我又没有自行车，真是心有余而钱不够啊。我知道谭淮远有辆车，可我平时和他没什么来往，那个年代自行车是贵重财产，一开口就找人帮这么大的忙，有点不好意思开口。我硬着头皮找他借车，他一听原因，二话没说就让我把车骑走。回来后，他还跟我调侃。我说她哥哥给我一根大前门烟抽，谭淮远赖兮兮地说：“那是让你走前门，别走后门”。后来我发配东北当了苦力，她转业回北京在什刹海少体校给自由体操伴奏，我自惭形秽，再也没有勇气去找她。

我们在校劳改一直到1969年9月底，其他的难友都分配了，就剩我和谭淮远。最后有两个单位愿意接收我们，一个是水电部一局，说起来是部直属局，其实就是在山沟里修水电站。另一个是首钢迁安铁矿，当矿工，都是苦力。但是迁安离北京近，怕我们威胁首都安全。我和谭淮远被一起发配到辽宁桓仁回龙山修浑江水电站。那里是水电工人有句俏皮话：“过了回龙山，母猪赛貂禅”。其荒凉可见一斑。

行前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离桓仁最近的火车站是通化，我想，建这么大的电站，一定会有在通化有个转运站，输送水泥钢材，我就买到梅河口转通化的车票，果不其然，那里每天都有发往工地的运输车队，就把我连人带行李直接捎到工地。我到水电站工地报到时，谭淮远已经来了。他选择了最短距离，坐火车在南杂木站下车，坐客运公司的车到了县城，再转到工地，自己搬行李，累的他够戗。

我和他一见面，他就向我介绍工地的生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这里食堂装菜用碗，因为汤水多，饭装盘子，窝头叫饼子。一天两顿窝头白菜汤，早饭棒子面糊糊咸菜。那年代讲艰苦奋斗，越是艰苦越向前。窝头好歹也是粮食，比四清时在山东临沂吃晒干的地瓜藤蔓强多了。我们都没有抱怨生活的艰苦，而是勇敢地迎接了挑战。我分配在混凝土浇筑队建大坝，他分配在山洞开挖队，都是最艰苦的一线苦力。我们的工棚隔一座山，彼此见面的机会少多了。

我听说他领了工资后又开始抽牡丹烟了，开山洞打风钻一天还有2毛的劳保补助，他为人豁达潇洒，出手大方，老有一帮年轻民工跟在他后面蹭免费烟抽。这一段时间我们的交往就是他借我的《鲁迅全集》好几个月不还，送回来已经又脏又破。这个故事写在我另一篇文章《我读鲁迅全集》，这里就不重复了。

林彪出事后，他正好在北京，回来的路上就在火车里大谈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乘客听他这么说，全都吓跑了，不知道到了哪站，军人上车把他逮捕了。那时候这新闻还是绝密，当地官员都不知道。核实他的身份后，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只好把他放了，告诉他别乱讲。他那张嘴哪是几个地方小吏能管的住的。他一路走哪里说到哪里，把个小小的桓仁县和水电局搅得天翻地覆。

后来知道他工伤失去了一根手指。听说是因为矿车滑坡，工人阶级和贫农民工一看危险全跑了，就他这个“反革命”拼命顶着，结果被矿车压断了手指。1971年那个电站的山洞挖完了，他们开挖队转移到吉林丰满水电站，去挖一条战备泄洪洞，一但打仗，可以把水库蓄水从洞里排出，听说他在丰满的时候水电部就要调他回北京，但他反而不肯走了，非要水电局赔偿他的手指头。我知道他不是为那点赔偿金，而是要出出在水电局受那些势利小人的恶气。1973年底，我也调离了水电局，就再没听到他的消息了。

谭淮远于去年8月去世，他上学晚，又留过级，我想他应该是1941年生，75岁。当年我们一起劳改时他就病病歪歪，脸色黑黄，能活到75也算命好了。

□ 来源：作者的《万维博客》

~~~~~

## 【乱世人生】

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下）

• 田炳信 •

（上接 z k 1 7 1 1 d）

田炳信：我这个观点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毛主席语录在全中国大量发行，或者说是泛滥，泛滥这个词不一定准确，你的《欧阳海之歌》起到一个前奏和推波助澜的作用。换句话说，《欧阳海之歌》就是准毛主席语录。虽然书里也有一些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但还是很少一部份。这书65年10月份是《解放军文艺》社正式出版了，首发是多少呢？

金敬迈：当时没有统计，反正是一发不可收拾了。陶铸看了这书以后就以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名义发了文件说：“中南地区有阅读能力的，都要好好看看《欧阳海之歌》这本书。”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等。

田炳信：换句话说，中国的造神运动其实最早从你这里开始，当然你不一定有意识，最早大量把毛主席语录引用到一部小说里面，恐怕没有人超过你。后来文革中的很多英雄人物都是以你这个套路，以你创造的这种模式，国标标准，大家都这样写了，王杰、门合、刘英俊、王国福都是这种模式的。

金敬迈：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指恶劣的东西很多，我不懂什么文艺理论，而且我也很反感这个。当时批这“黑人论”，这个《欧阳海之歌》恰把“黑人论”都给批了，我这不是有意识

的。一些中间人物，现在把它找出来，它是批判得这个黑方面，都可以拿来说事，按照毛的教导，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本人的实践证明，一个小资产者和工农兵一结合，屁股一挪过来，观点一改变，立场一改变，他就写出好东西来了。说明这个了吧，有些人是书读多了，越读越蠢，而这个只读毛主席语录，越学越聪明。这都成了很多真理的证明，证明那些所谓的真理。于是乎，新华书店就到处排长龙了，刘少奇的印1500万册也不多，到处都买不到了，于是全国所有的报刊杂志都转载，广播电台也广播，长篇累牍，从头到尾都是《欧阳海之歌》，《人民日报》也在选登。

田炳信：这么多转载，这么多报刊登，你一共收了多少稿费？你不是发达了？说实话，你也是万元户了。

金敬迈：《欧阳海之歌》发了之后，《收获》给了我2040元，我记得非常准确。

田炳信：这是你收的最丰厚的一笔稿酬？

金敬迈：对。本人交了1700元党费，还剩340元，我还了180元的债，因为本人以前欠了亲朋好友的钱，剩下的钱我买了一台上海牌收音机，花了160元。第二笔是《解放军文艺》跟我说：稿费只能发一次，不能重发，由于我在《收获》发表之后，又作了修改，就送你这些书。就送了200本书，给了300块钱稿费，我又交了200元的党费，留了100元。然后就再也没有了。加在一起，就总共2340元的稿费，交了1900元的党费。后来我不是给逮起来了，谢富治通知全国的银行，冻结金敬迈全部的存款，结果在北京沙滩那里冻结了我600块钱的存款。这批钱是我调到中央去之后，我要抽烟、交伙食费啊，老婆凑了300块钱，老战友们凑了300块钱，说：“老迈一个人在北京，别让他为难。”总共600块钱，我就存在沙滩，还没用呢。后来我给逮起来了，等把我放出来的时候，78年底，就是11年以后，沙滩给了我700多元，600元本加100多元的利息。

田炳信：就是说，11年增值100多元钱，是吧？

金敬迈：嗯……

田炳信：你的书出版之后，不断的在改，一会增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会又去掉，后来又说欧阳海在书里批判了刘少奇的《修养》。63年开始批刘少奇，按说欧阳海一个小兵，哪敢哪够格批当时国家主席啊，不是早抓起来了嘛？！这一段说法是有争议的，不知道是否确有其事？

金敬迈：（调侃的语气，自我解嘲）本人神圣得很啊，65年就很红了，到处去做报告了，到哪都是人物了，所到之处都被围着签名，很神气了。年底，先是江青有指示了，是谢富治告诉广州军区，广州军区政治部一个副主任给我传达：江青同志看了《欧阳海之歌》，认为写得很好，不容易……，但是，有三条个人意见，一是欧阳海是怎么怎么要饭的，二是后来被国民党抓了怎么怎么的，三是最后欧阳海牺牲的几秒不好如何如何。很严肃，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于是乎，我就不知怎么办，因为这三点都是不存在的，无中生有的。

田炳信：那她是没看吗？

金敬迈：没看明白。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认真看就知道了，我就没吭声，也没动手改。后来65年底66年初，我不太清楚了，陈老总和陶铸到广州来了，接见了我。当时陶铸问我：“这本书，大家看了之后有什么反映？”这时总政有个简报，给认真详细地记录了，包括哪里排长队的，哪里要求买多少的，哪里学习后深有体会地说如何如何好的，都是正面的评价，报告给总政首长的。陶铸看了之后，就问有些什么批评意见。陶铸问我，我就说：“总政传达了江青同志的三点意见。”“是什么意见？你说。”我就把三点意见说了，说完了，大家

都不吱声，在场的有陈毅、陶铸、王匡等中南局的主要领导，陶铸就跟陈老总说：“陈老总，你说嘛！”陈老总说：“她的事，我不沾。我就喜欢看你们的《羊城晚报》，我就不看《人民日报》。”陶铸叫吴芝圃谈，吴芝圃也不谈。王匡也不说话，气氛突然变得很凝重。

田炳信：陈老总是高人啊，“她的事我不沾”。

金敬迈：陶铸就说：“那我说吧，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这部文艺作品嘛，哪有十全十美的。我看这样子，今后啊，有关这篇小说的修改，都要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田炳信：他是政委喔，广州军区第一政委。

金敬迈：他表态了，不改了。他陶铸多厉害啊，你江青算什么！就这样子，就不改了。这是第一件事，后来江青又传达了，这是军区首长转达给我的，江青命令你去浙江写蔡永祥。

田炳信：你又去了？

金敬迈：这是江青的指示，传给萧华，萧华又转到广州军区，军区告诉我，打着背包去，到浙江写蔡永祥。后来只好打了背包去。一去到南京军区，人家主任部长都在那等着了，一见我打着背包就乐了：“你这是干嘛啊，打着背包，这不是作假么？”然后一起把我请进招待所里好吃好住招待起来。南京军区李汝清等几个主要创作人员正在写蔡永祥，一听说金某人来了，就是皇太后派来的人，赶快必恭必敬地把手头上的资料、书稿、题纲一一奉上。我说不能这样，我们合作吧。哪能这样呢。

田炳信：其实在你没出名之前，他们比你名气大。最后蔡永祥写出来了吗？

金敬迈：没有。

田炳信：那报纸不都报道出来了吗？

金敬迈：报纸上有，但小说绝对没有。这个事迹肯定是个假的，一看就能看出来了。

田炳信：你当时一眼就看出是个假的了？你就不想写了。

金敬迈：不能写，这明明是假的嘛，怎么写？我很苦恼，这是江青交给的任务，不完成是不行的，但我又不能写。于是我就在那桥上站了一个月的岗，亲自观察了一个月。那条桥上面有战士站岗，每十分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是交通的枢纽，而且灯火通明。蔡永祥是一点钟上的岗，夜班一个小时，事情发生在1点15分，是蔡永祥上岗之后15分钟，一个阶级敌人在铁轨上放了一根棍子，企图把火车颠覆。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是1.44米，而棍子不够1.44米长，搭上这头，那头就搭不上了，必须要长于1.44米的才行。而且这是根本棍，细木棍怎么能把火车颠覆呢？我说这木棍不足以把火车颠覆，后来他们就换了个水泥的，但里面没有放钢筋，火车一压就碎了。我就很为难了，我要写一个阶级敌人放的，不能写一个地主，但是最恨红卫兵的应该是走资派，但走资派算什么啊，怎么的也是浙江省委书记啊，杭州市委书记啊，他不一定自己去放，但是他指使人去放，这样才能冲突得起来，他才能去反对文化大革命。一个地主分子怎么能反文化大革命呢？那我到哪里去找对立面？新闻报道可以只说是阶级敌人，但小说就要有具体的人物。王二麻子是走资派，被红卫兵打倒了，心怀不满，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仇恨，对毛主席的不满，要来杀害红卫兵，我得把这个帽子圈起来。

田炳信：那到底有没有蔡永祥这么个人嘛？

金敬迈：没有嘛，连个棍子都是后来补充的。

田炳信：那死的人死了。

金敬迈：怎么死的也不知道，成了无头案。

田炳信：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金敬迈：不可能知道嘛，人都死了，报道写完就完了。但小说我可不能写，我可负不了这个造假的责任。

田炳信：就没写成。

金敬迈：我就打报告，告诉萧华，萧华就很同情我，就悄悄告诉我说，千万不能再提了，不能再反映了。于是，我就在那里当了一个月的兵，之后，就打了几次报告给总政把情况说清楚，不写了。大概萧华也给江青报告了，说是金敬迈有事请示，于是总政马上传来指示，让我马上赶到北京，我只好立即往北京赶。当时大串联已经开始了，挤得不得了，飞机票也买不着。最后他们就从杭州用小车把我接到上海，在上海火车站的月台上，把我从列车窗户塞了进去。我终于到了北京，见到了萧华。萧华说：“你说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会给你解决的。”我也就不能再说了，再说这个是假的，就等于说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报纸已经登了这件事，不能再说是假的了。到了10月11日，江青就在京西宾馆见我了。

田炳信：当时如果你继续说，也许恶运就提前降临到你头上了。还是没经验啊，如果有个人指点一下，你就不得了，也许今天我们也没机会见到你了。

金敬迈：我认为我目前这种结果是最好的结果。

田炳信：其实如果不出这个事，你最后还是逃不过这个劫。

金敬迈：我那就成了劳改释放犯。而我现在是遭受迫害，光荣出狱。

田炳信：对，其实你这一劫是提前了，提前得很好，假如当初没有被江青迫害，一直为江青所用，粉碎四人帮后，最少被判18年。

金敬迈：再回到刚才的话题，我在北京见到江青，江青一见面就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骂我，后来我才明白。就是她要用我，但要先给我一个下马威，就是“你金敬迈很牛，但在我江青面前，你要老实点”。当时一见面就斥责我：“我给你说的话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那为什么不改，是不是陶铸叫你这么写的？”我说：“不是，不是。”其时总理也在场，我坐在总理和江青中间，还给我夹菜让我慢慢吃。周总理陪着坐了一会儿就跟江青说：“江青，我还有事，先告辞，你们慢慢聊。”总理走了之后，我们又谈了好多别的。谈话之后，本人就负责“五·一”庆祝活动的文艺演出，接着，我又负责“5·23讲话”的有几篇纪念文章的审稿定稿工作，还负责文艺口，接着中央决定接管文化部，具体工作由金敬迈同志负责。

田炳信：其实你是文化部的部长，但没有任命，叫负责人。

金敬迈：不，叫文艺口负责人，我当时的头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叫“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这是报纸上的头衔。

田炳信：那后来《欧阳海之歌》是不是又有些改动？

金敬迈：对。还回到刚才江青第一次见我那段，江青当时问我：“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书里面是不是陶铸让你加的？”“不，不，不，是我自己加的。”“我看你就是中‘黑修养’的毒太深。总理说了，总政有个报告，《解放军文艺》社又印了50万本《欧阳海之歌》，还在仓库里面，如果这‘黑修养’不删掉，那是不能发行的，要懂得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战略部署。光删掉不行，想放了毒就走，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田炳信：指谁放毒？

金敬迈：就是指我书里面引用了一些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总理的意见是把那些内容删掉。江青说：“光是删掉不行，还要消毒。”后来，我就只好根据她的意见修改，那是个很困难的过程。是这样子，那本书在370多页内有两页纸里头引用了两段“黑修养”，

她要把这50万册书剪下这两页，重新写两页，没有“黑修养”的，按照那些字数写好印好，再请了两百多个女工来粘，后来一查，不是50万册，是65万册，200多人，粘了几个月才把这些书粘好。

田炳信：这些书你现在还有没有？

金敬迈：没有，很难找到了。就这样改了，说是欧阳海看见窗台上有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风一吹，就掉到窗外去了，窗外正好是一个垃圾桶。写完以后，就送给江青，江青看完之后，还给我复了一封信，那封信我到现在还保存着。有人说，你把信拿到香港去卖了，起码能卖10万块钱。信是这样写的：“萧华同志转金敬迈同志：修改后的《欧阳海之歌》收到了，我读了以后，觉得比原来的好，可以先发表，以后我再找人写文章，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江青。”

田炳信：那信没给抄走？

金敬迈：抄走了又发还的。我一抓，全部东西就给抄了送中央去了，四人帮一倒，就又全部发还了，要不那些照片早就没有了。但有些值钱的东西没有了，郭沫若给我写了几幅字，没有了，我有几千张邮票，也没有了。那个龙票，我起码有几百张，没了，我小时候集邮。

田炳信：有人识货，拿走了。

金敬迈：这一段是我修改的，自觉自愿修改的，在有一本书上我写到：总理说，《欧阳海之歌》修改，你一定要听江青的。江青说，不不不，你听总理的。

田炳信：刚才谈到作为个人来讲，你创造了几个第一，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第一是摆在这的，发行3000多万册，无论大小，报刊都同时转载。不知道有没有印成外文？

金敬迈：有，多种文字的，当时就有。

田炳信：你从一个普通的创作员一下当上了文化部长，文艺口的负责人，实际上只当了123天，然后就进了秦城监狱，一关连劳改就是11年。大家刚说你红了，你就紫了，刚说你大紫了，你就变大黑了。那你回顾一下你的前半生是否有一种神秘之手在冥冥中拨弄你的命运？

金敬迈：我是天生的无神论者，那些气功师当着我的面来表演，我也只是把它当作魔术，没当真，我也解释不了，但我也不信。

田炳信：你怎么概括这段历史？

金敬迈：我不客气地讲，我很聪明，我一去，我连续打了三个报告，我不干。我没有什么小人得志，一下子到了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解放军负责人，那该多神气，我不。我那时候在装孙子，无论谁都能感觉到我很好脾气，我不管见到谁，我都先敬礼，见到狗屁我都先敬礼，我明白你是狗屁，但我都还是先敬礼。我见到广州军区任何人，狗屁不是的，比我年轻的，我都是先敬礼，完事了，我就请示，我可以先走了吗？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做人。

田炳信：就在你最得意的时候？

金敬迈：对，最得意的时候，我打了三次请辞报告，后来江青发脾气了：“中央选择了你，你不想跟中央合作是不是？”“不不不，我没有当过班长，怕当不好，责任太大，怕耽误了党的工作。”江青说：“你放心，以后给你时间写作。”她很赏识我，认为我很有本事，首都文艺界是首个联合起来，不打内仗的。我说说我的命运。陶铸不把我推荐给总理，推荐给江青，我也要完蛋，我不反对军区，我也不跟他们站到一起，只要不反对，我就会成为黄永胜的爪牙。那么在黄永胜前，陶铸会用我，他到北京，我成了陶铸的爪牙。叶群也找过我谈两次，

我会成为林彪的爪牙，我后来成了江青的爪牙，我干下去，肯定就成为江青的爪牙。因为我也分不清哪些是对哪些是错，而且有些可能是毛的意思。我知道“大跃进”不对，我知道“大炼钢铁”不对，这些我当年就知道，我也没敢说反对“大跃进”，反对“大炼钢”。那么后来叫我在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我也照样干了。尽管我对江青印象不好，觉得这个人太难侍候，朝令夕改，朝三暮四，一会儿一个主意，说话不认帐，但我不敢反抗。是她说我反的她，但我从来没有反她，一脚把我踢到监狱里去，所以我落得个完尸。

田炳信：当年被抓的原因据说有两个，一个是北京一家电影厂给了些三十年代电影资料，交到你那里，就说你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第二个，说你正好在毛主席南巡期间，你坐着专机回到广州，说你要谋害毛主席。这两条罪都是大罪，到底有没有这些事？

金敬迈：当然有。关于“黑材料”，是67年的事，我5月23日正式接管文化部的。6月份的某一天，一个分管电影口的女同志，姓舒，专门负责给领导人照相的，她跟我说：“电影家协会有个资料馆，里面有江青三十年代的剧照，共有5部电影是江青演的，每部电影有几张剧照，还有些电影杂志的月刊订本。”电影资料馆被造反派占领了，其中全国要纠叛徒，在旧报纸、旧杂志里面找那些登过的反共声明、反党启事、悔过启事，一找到就抓叛徒。但这位姓舒的就比较敏感，她说：“老金，现在有人到里面去翻资料，里头有些三十年代电影资料，万一让他们翻出来，影响多不好啊。怎么办？”我说：“这些东西不能动，本来没问题的，你现在说不准看了，这不是引起别人注意，不是说江青有问题吗？”当时我想，江青同志历史光明磊落，有什么不值得看的，你为什么把东西收起来啊。

田炳信：你就暂时不让动。

金敬迈：我就不让动。

田炳信：这不就对了么？

金敬迈：我去请示。

田炳信：你这一请示就出问题了，犯大忌了。

金敬迈：我就去请示戚本禹，这时候，江青来了，她看电影来了，她说你陪我去看电影，她要问我很多文艺界的事。她问我们在谈什么，我就只好如实汇报：“我跟他商量在汇报电影资料馆里头有些三十年代电影文艺小报，里面什么内容都有，我在问老戚，是否收上来，免得年青人不懂得当时的历史，造成一些误解。”

田炳信：这是原话吗？

金敬迈：是原话。

田炳信：这不是很好吗？没什么问题啊。

金敬迈：她可不是这么想，她立刻就说：“那收什么呢？你们让它扩散嘛，扩散嘛！”不看电影，蹬蹬蹬就走了，电影也不看了。

田炳信：擢到她痛处了。

金敬迈：嗯，擢到她痛处了。戚本禹就火了：“你请示什么啊，你把它收上来不就完了嘛，真是！”那我只好叫人收了上来。我就叫人去收电影资料，又叫分管图书馆的一个同志去收。然后就全收到我这里来了。

田炳信：你全看了？

金敬迈：我没看，但我要清点数量嘛。收好之后，我就送去给戚本禹，我跟他说：“对外就说是我收上来的。”戚本禹就说：“这么多东西，放我这不合适，我这里乱七八糟的，放不下。这样，你去找谢富治，公安部管，你找他去。”我就只好去找谢富治：“我这里有些江青同志让收的三十年代电影资料，放在你这里。”“我怎么管得了呢？找总管，找汪东兴

去。”我只好又去找汪东兴，汪东兴一听就说：“我正要陪主席南巡，我哪有时间管这事，你还得找谢富治。”“我找过了，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找中央文革负责同志，我实在太忙，没时间。”

田炳信：看来人家都是明白人，都不愿沾。

金敬迈：最后我找到王光宇，他说：“这样，我叫人给你找个最好的保险柜，你把它放里面锁起来，谁都不要动。”隔了两个月，陈伯达找我谈话，他们要抓那几个具体收的人，不知道幕后指使的人是我，把刘巨成和一个叫徐辉其的人给叫到人民大会堂，半夜三更给叫去，我带着他们俩去的。到了那里，吴法宪就在那里了，他们问：“哪个是徐辉其？”“那个！”

“好，你回去，他们俩留下。”我想我有车，他俩没车，半夜怎么走啊，我还是等等他们。过一会儿，回来一个，是哭着回来的，我就问：“怎么了？”“他们说我们搜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我奇怪了：”收什么中央领导的‘黑材料’？”“就是图书馆那些。”“唉，那是我让你收的，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事不用你管。”“再过了一会儿，另外一个也回来了，也是哭着出来的，然后这个又给叫去了。”

田炳信：来回问。

金敬迈：我就说：“哭什么，大男人，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这事中央都知道，我都报告过了，没事没事。”最后，两人都出来了，背后跟了两个人，把人带走了。这时，天也快亮了，我烟也抽完了，就在烟灰缸里捡些烟屁股抽，我在桌上拿张白纸，给谢富治写了个条子：谢副总理，我有急事向你报告，只耽误你几分钟。过一会儿，谢富治出来了，一见我就说：“不是叫你先回去么？怎么还在这里？”我说：“抓了两个人，那是我让他们去收的。”

“你叫他们收的？你好大的胆子。”我说：“这有什么胆子不胆子的，戚本禹知道，中央文革领导也知道，是他们叫我收起来，说不要扩散。我还向你报告过呢，你叫我去找汪东兴。”

“哪有这种事，你，你，你，你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事情？你有文字报告吗？”“我是口头向你报告的。”“口头报告，那能做什么证明，你不要胡说八道，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想：嗨，这么没出息啊，这多大个事啊，要杀要剐我负责，与他们俩个无关。吴法宪就说：“老金，这不关你的事，你别急。”我说：“我不急，我这个人嘻嘻哈哈惯了，我从来不着急。我要收集‘黑材料’，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傻的反革命吗？真是的！”但他们没理会我，还是把人带走了。

后来我一想，这事是个大事，我得赶紧向总理报告。因为我隐隐约约听说是陶铸把我推荐给总理的，我自以为是总理的人，而且总理威信又那么高。我就认真真地把事情的全过程真实地向总理写了个报告，我说我是个小兵，他们都是领导，水平高，能力强，如果他们都否认，我金敬迈宁愿以死来表明我的清白。我有个秘书，他看了之后跟我说：“老金，你这么写恐怕不行，不妥当，我建议你找他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我说：“不，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几个人一起商量就变成有组织的反革命活动，我这是个人行为，我跟总理写信，他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到底写什么你也不知道，否则就是背着组织，搞小团体活动。”他说他认识陈伯达的秘书，可以找陈伯达，我说不，不找任何人，直接找总理。完了我就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说：“我有重要事情请示总理，你能不能不拆开来，直接送给总理看？”“如果你在信封上注明了，写好你的名字，我们会按你的要求交给总理。”因为这里面牵扯到的江青、谢富治、汪东兴，都是重要人物，红得发紫的人物。我送信过去，半小时后，值班室来电话说：“我们把你的信已经放在总理的案头了，你放心，我们没有拆开，这是纪律。”我当然就放心了，该干啥干啥。信很长，近万把字。

过了两天，什么事没有，到了第三天，戚本禹突然要召开文艺组的人开个紧急会议，我听了就说：“老戚要来，我们到楼下去接一接。”大家都下去了。接上来之后，我就组织开会了，“请老戚指示。”这时，舒世俊突然站了起来：“老戚啊，我发现我们这里有两面派。”老齐说：“不会吧，怎么会有两面派呢？”舒世俊说：“我们这里有人背着你就说老戚这个不对，那个错了，刚才又叫我们下去接你！”我一听明白，这是冲着我来了，“哎呀，舒世俊同

志，我看这是在说我，我在背后是说过老威的不是，刚才也是我叫大伙下去接老威。”老威说：“你可以不承认嘛！”我说：“我承认，我两个都做了，而且是做对了。说你的不对，因为确实你错了，你说毛主席指挥战斗的电报，看不看都无所谓，其实那就是作战指挥的一些技巧，我们部队认为那体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所以你那话是不妥当的，我指出来，是因为我当兵的时间比你长，教你一招。刚才下去接你是因为你是我们的领导，是尊重你，出于礼貌。”

“你有证人吗？”“周少泉在场，他应该记得，我跟他还议论过这事。”“周少泉，你站起来，你听我说过这样的话吗？”隔了半天，周少泉说：“我没有听过。”“那我就承认我是两面派。”我无话可说。“不，不，不，你完全不必那么委屈，你现在手眼通天，你完全不必委曲求全，你完全可以直接给总理反映嘛！”总理把信转给了江青，所以你们说总理如何如何伟大，我不认同。信转给江青，他安全了，我就更大罪了。不仅收集中央领导的“黑材料”，还污蔑江青，又污蔑谢富治、汪东兴。

田炳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许多人都比你聪明。再说说第二条罪——“绑架”。

金敬迈：事情是这样的，67年8月10日，我感冒了，那时候我还红着呢，领导对我很重视，让我好好休息三天。我当时6月份是从浙江杭州给送到上海再去的北京嘛，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这时已经是8月份了，杨成武给了我两套军装，随身带的衣服都破了，天热得有衣服换一换，不能老穿军装捂着，我就想回去家里带几件换洗衣服。刚好这天，杨成武的秘书告诉我说：“有一飞机飞广州，你说了好几次了，首长说，你要回广州，就坐飞机回去。”刚好我休息三天，就赶忙回家一趟。回到了广州，广州正在武斗，不能降落，就在佛山机场降落了，而佛山降落停一下，马上又飞回北京去了。这架飞机是前苏联送给我们的，我们用大豆鸡蛋换回来的，是一架图1024式飞机，是去广州试飞去了，就回来的。当时一般人也不知道金某人何许人也，一上飞机就向我报告飞行情况，广州不能降落怎么办？我就说：“按你们的程序办就得了。”飞机降落到佛山马上就返航，我连家都没有来得及回，就这么件事。后来又刚好杨成武说是反对林彪，要对毛主席干嘛干嘛，所以就扯到一起，说我飞到广州组织策应部队800多人，组织敢死队40人，建立一个4411秘密电台，阴谋等主席到达广州，本人作为前敌总指挥，把毛绑起来，北京就宣布政变成功。

田炳信：这些都有文字记录吗？

金敬迈：他们口头说，要我交代，交代这些事情，我当然不能交代，我交代不是上当了吗？交代不了就说不过去，我要捏造出策应部队司令来，敢死队队长来，电台台长，我到哪交代去，是子虚乌有的事嘛。

田炳信：那后来你是什么时候被抓起来的呢？

金敬迈：是“黑材料”事件之后被抓起来的，这个“绑架”事件是抓了以后，硬加我头上的，要我来认的。我坐了牢以后，杨成武他们不是又平反了，重新上了天安门了吗？那我一个人怎么绑毛主席？我连车都没有，我还能把主席绑了背着跑？我背得动吗？

田炳信：你是在广州被抓的？

金敬迈：我在北京被撤销了权力，回到广州，我成了罪魁祸首了，其他人都是好人。

田炳信：抓了之后，就一直关着，也没有判什么刑？

金敬迈：一直关着。

田炳信：他们抓人的时候打不打人？

金敬迈：你了解中国人嘛，而且打得不轻，很惨，很惨……用一句话来概括，绝对不比日本鬼子更善良……

田炳信：抓你的时候，家里人都在？



金敬迈：老伴，儿子都在。

田炳信：他们都知道你出事了？

金敬迈：知道，因为我得罪的是最高层，我知道必死无疑。

田炳信：你是关在秦城一号监狱，能说说那是是什么样子的吗？

金敬迈：当时抓的人太多了，把房子一间隔成两间。地上放块板，在离地面很高的墙上有个窗户，有铁栏杆。有被褥，没床单，有个厕所，厕所有个观测口。

田炳信：书、报纸能看吗？

金敬迈：报纸后来有。

田炳信：里面最难熬的是什么？是寂寞，见不到人？还是……？

金敬迈：我有本书，里面写了很多里面的情形，读过的人都说真实。如果《欧阳海之歌》得15分，这本书可得120分。

田炳信：叫什么名字？

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

田炳信：再问个忌讳的事，想没想过死？

金敬迈：死过，没死成。在广州的时候就自杀了。

田炳信：什么方式？

金敬迈：用小剪子，割脖子。

田炳信：后来给救回来了？

金敬迈：不是，没有常识，找不到动脉，把肉割开了，没找到动脉。没死成。

田炳信：听说你老是在做一个梦，梦见一只鸽子，老飞不出去，而且做这个梦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金敬迈：我被抓走之前，养了一批鸽子，共有20多只，在牢里一直做这个梦，到现在都会做。

田炳信：跟你在秦城的经历有关吗？

金敬迈：做的梦不仅可怕，而且是恶心，让人窒息：满地的粪便，满地的死尸，我脱得一丝不挂，光着脚趟过齐脚脖子深的粪水，爬过去。我爬不动，又非得爬，前面有一个洞口，透进一丝亮光。我使劲爬，踩着粪便，在尸体堆里爬，两只脚踩着屎，两手拨开一个尸体，抓住另一个尸体的脚，总算来到洞口，只可惜那儿只有窄窄的一条缝，最多只能伸出一只手去。窄窄的洞口上挂满了粪便，有几个腐烂的人头长在缝里，人头上七窍里蠕动着无数的蛆，头上是，满地都是，我身上也是蛆，成堆成堆的蛆在爬，在吃人的肉……我常常被自己吓醒。有人说男人的梦是黑白的，女人的梦是彩色的，狗屁，我的梦金碧辉煌，彩色的。

田炳信：你在秦城关这么多年，也不放你出去是吧？

金敬迈：开始不放，两个月后就可以放放风，慢慢一个礼拜能放两三次风。

田炳信：能不能看见月亮？

金敬迈：看不见。牢是没有盖的牢，放风时走动，晚上不放风，看不到月亮。放出来那天是多年来第一次看见，大概是十五。

田炳信：出来是什么感觉？

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就是我的感觉。原来的天，都是透过方格栅栏看见的，三十二块方块，现在看见这么大的天，怎么这么大的天啊。

田炳信：放出来之后，又到河南劳改去了，河南哪里？

金敬迈：许昌。部队的一个农场，就好很多了，部队对我还是很照顾。

田炳信：你怎么通知你的家人，你出来了呢？

金敬迈：我一出来，就给家里人写信了。我放出来当天就上火车去河南，我跟李英儒一起，李英儒比我大十几岁，是老同志，大15岁嘛。他放出来后，临上火车前还回了趟家，看了老伴。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他回家后，老伴塞了些钱给他，我已经多少年不知道钱是什么样了。我就向李玉儒借钱，他问借多少？我说借一块钱。他凑给我一块钱。我想找谁去买信纸、信封和邮票呢？刚要借给我，他又收回去了，说：“你不要找我借，你找我借，他们会说我俩有什么特殊关系？”

田炳信：他又要回去了。

金敬迈：又要回去了。我想，那算了。我就去找押送我的保卫处长，我说：“我多年没给家里联系了，我想跟家里人写封信，我身上没有钱，没有纸、笔，没有信封邮票，你们哪位能借我一块钱，哪天我跟家里联系上了，还给你们。”“那，用我的！”扯了一本信纸，一叠信封，一长串邮票，都是在北京刚买的。我说：“我只要一个就行了。”在我关在广州的时候，老伴在一本《红旗》杂志里面给我夹了一张邮票——毛主席去安源。我很明白她的意思，就是让我想方设法给家里去封信，报告情况。我被抓到秦城后，给抄走了，现在放出来，又发还给我，我就用这张邮票将信寄回去了。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姐姐，一封信给我武汉的一个好朋友。我姐姐在电信局工作，先得到我还活着的消息，急着发电报给我老伴，结果心急没看清楚，下楼梯时绊了一跤，给摔晕过去了，醒过来后，就说：“赶快给我弟妹发电报，电文是：迈弟已来信，详情另告。”电报就发走了，我老伴上班收到电报，老伴当时就很难受：“我这么想念你，你却先给你姐写信。”心里很委屈，好在旁边有个大姐说：“不急，11点还有送信的来。”她就很难过地在旁边等候，直到邮递员送来我的信，她这才宽慰下来，回去告诉家里人。

田炳信：你那时候对毛泽东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还是很愚忠？

金敬迈：那时候，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在说反话，知道我在干什么。

田炳信：你在秦城是怎么打发寂寞的？你有什么招没有？我觉得对人最残酷的是让一个人不能跟外界交流。美国有个监狱叫绿岛，条件很好，但就是让你一个人呆着，不让你见人，既不打你，也不骂你，一日三餐有饭吃。最后很多人都给逼疯了。

金敬迈：秦城里头大概50%左右的人最后都疯了，我之所以没有疯，是因为本人招数多。牢里头有本《毛选四卷》。

田炳信：你就去读？

金敬迈：你以为字字真理，谁去读啊！

田炳信：那你干嘛呢？

金敬迈：猜。猜第374页有多少个标点符号，猜48个，打开一数，1、2、3……7、8……32，怎么搞的，只有32个，怎么不多点几个标点符号呢？让老子猜中嘛。再来，508页，还猜48个，打开数，1、2、3、4……50，不对，又没猜中，狗日的。就这样骂骂咧咧，打发日子。

田炳信：还有呢？

金敬迈：本人姓金，汉字里金字旁的有几个，一个个数，围着牢房转8字，转一圈说一个，搜肠刮肚想。然后是金、木、水、火、土，单人旁，双人旁，所有的边旁部首都数一遍，笔划最多的字，繁体字。

田炳信：玩几天就腻了啊。

金敬迈：还有，好多招数，不断地想。

田炳信：那是锻炼大脑的，锻炼身体的呢？

金敬迈：有，洗手，左三次，右三次，抹肥皂，当时半个月发4分之一块肥皂，省着用，洗衣、洗澡都得用，抹一下肥皂，搓四十八下，再搓四十八下，就这么玩。洗完之后，甩手，甩干，不用毛巾搽，甩四十八下，慢慢甩，甩得干干净净。再后来洗澡，天冷洗冷水，先把身体擦热，左三下，右三下，直到全身通红，洗个澡两个多小时，然后满地都是水，没有下水道，就用破衣服放地上沾起水，拧到碗里头，倒到厕所盆里，就这么洗。因为整个房间全是水，总得一点一点地把水吸起来，擦干。最后把整个牢房擦得油光逞亮以后，再把水倒掉，因为碗还要用来吃饭，就把碗洗干净。

田炳信：真不容易。50%不疯的估计也半疯状态了。

金敬迈：我当时在监狱里，一天到晚就琢磨着怎么“犯罪”，“犯罪”欲望很强，就是要干点你不准我干的事，自得其乐，本人在里面抽过烟。

田炳信：你是怎么整的？

金敬迈：我要把烟头捡起来，捡一个不行，要捡好多个烟屁股才能凑成一根烟，三个烟头凑成一个喇叭筒。我怎么假装摔跤，怎么把鞋子踢出去，刚好把鞋子踢到烟头旁边，怎么在捡鞋的时候把烟头捡起来，怎么收好带回房里去，第二天放风的时候，不能又再摔跤，就得想别的办法。自己一天到晚就是策划这些，怎么样“犯罪”。等烟头捡齐了得考虑怎么样把烟点着的问题。没有火，怎么点？说是把棉花搓久了能冒火，搓死了也不见半点火星，就只好等哪天打雷，把电闸震掉了，牢里点蜡，因为牢里是不能没有亮的。好不容易等到这一个晚上，烟刚刚点着，电又来了，那烟屁股刚点着，你马上把它捣灭，那得等到哪天才打雷，而且又要停电，这得猴年马月。干脆我就抽起来了，马上被狱卒发现：“哪里来的烟？”我说：“哪来的烟，你再问我就说是你给我的。”那狱卒惊恐万分，又惊又怒，又发作不得。

田炳信：你现在怎么看欧阳海这个人物？

金敬迈：这几句话说不清楚，我利用了欧阳海这么个名字，人家说我这是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实际上是小说，故事梗概是欧阳海的，但故事里是本人在部队里面的感受，那也不能说欧阳海是假的。是创作，是长篇小说，不叫长篇纪实小说。但故事写完之后，人家看了都说：“欧阳海就是这样的。”我又不能说欧阳海不是这样。其实我笔下的欧阳海是我心目中的成百个战士的结合体，我是借用了欧阳海的名，欧阳海的魂，但写一个战士抗他的领导，这是我的思想，欧阳海和他的领导不那么和谐，我推波助澜。

田炳信：雷锋和欧阳海都是在文革之前部队推出的两个英雄，这两个英雄出来不久，文革开始了，这两个普通士兵的精神，他们的魂，是提炼出来了。

金敬迈：欧阳海当时被看得那么重，就是被当成追寻主席的文艺思想，深入生活，改变立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向英雄人物学习开出来的一朵艺术之花。

田炳信：换句话说说是被政治家利用了。

金敬迈：被政治家大大利用了，我才有可能从一个普通的创作员，一跃而成为全国文艺口的负责人，这是政治需要。而我本人，是歌颂了一个正直的、勇敢的、无私的解放军战士。这

里头由于我的水平问题，有些人物性格有点左，家庭观念没什么的，有不真实的一面，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存在，作为一种精神，还是真实的。

田炳信：欧阳海是文艺创作，但用了真名。

金敬迈：对，文学艺术是对生活的提炼和升华。

田炳信：最后谈两个问题，你最骄傲的和最遗憾的是什么？

金敬迈：最骄傲的是：我生逢其时。我小时候很苦，是南京人，抗战时跟着父母到过湖北、四川万县，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10岁以前就开始卖烧饼油条换钱。

田炳信：其实欧阳海的少年就是你真实的感受。

金敬迈：他的四妹子就是我写我自己的妹妹，我妹妹后来救活了，现在在长沙。

田炳信：我看一份资料讲过，彭德怀看了之后，也勾起了他对童年的回忆。

金敬迈：对。我为什么第一次读的时候哭了呢？因为我是在写自己的童年，我没有到农村生活过，我把我的城市平民生活植到欧阳海身上。我生逢其时，我18岁去参军，国民党太落后了，非完蛋不可，我是抱着对民主、对自由、对平等、对博爱的向往来到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我没有想到，我们有些领袖他完全不懂经济，他完全不懂得生产，甚至他完全不懂得革命，不懂得家庭，不懂得社会发展史。家庭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细胞，恩格斯的理论里就是这么说的，从前苏联到中国，凡是搞集体化，凡是破坏了家庭的农业，没有一个搞得好的。之所以承包到户就好，就是因为它承认了家，家是人类最温暖的怀抱。从搞互助社会开始，我们就在破坏这个家，到后来砸烂铁锅，到集体食堂去吃饭，这个属于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社会史最基础的东西，他都不了解。他以为只要把人组织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把人组织在一起，这个社会就解放了。所以才会有了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是纯属人为灾害，在历史里头，有几千万人饿死，这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的。饿死几千万人，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田炳信：真正的历史是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且这种记忆会流传下去。那你怎么又是生不逢时呢？

金敬迈：我又生不逢时。我已经76岁了，再活10年20年，总得死吧。死不可怕，但我总想看到承认事实，总是弄虚作假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子孙？我们还在糊弄人，你看那些农民真的苦啊，这两年，温家宝才取消了农民的很多税收。我不知道农民是怎么过日子的，但我知道乡镇长是怎么吃怎么喝的，照样喝洋酒，没有钱买车，照样每年报几万块钱的“的士”费。看看我们官员之多史无前例的，我们平均十几个人就要养一个官员啊，怎么养得起，每个官员都那么能喝。本人最近去粤北写个东西，到了之后，我特意吩咐不要陪我吃饭，就到饭堂吃，但当地官员就硬是要陪，从早餐起，一直到晚上还要宵夜，一顿饭个把小时，连创作写东西的时间都没有。喝轩尼诗，吃山珍海味。我不喝酒，但他们喝。吃，喝。

田炳信：可找到机会喝了。

金敬迈：现在又提“人本主义”、“人文关怀”，那我也算是生逢其时了。而现在不准人说。如果你说：老金，你错了，你说的一、二、三都错了。我就认同，无话可说，但你说都不让我说。不是有个木桶效应吗？它的容量决定于最低的那块板，现在有十块板，九块非常结实，一万年都不烂，但有一块不是短了，而是朽了，要烂了，那么一旦这块板烂到底，你就一滴水也装不住了。主旋律是好的，90%是好的，但这块是关键。怎么就不准别人讲呢！好的会一直好下去，但是坏的不换掉，就烂到底了。我生逢其时，我经过了跌宕起伏，我的经历，我的见识。当年我被批判的，实践证明，我都是对的。我没有愧对人生，我文化不高，只上到高中。后来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在这个社会大学中学来的，有对有错，但主流是对的。

田炳信：其实，人到晚年能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也不容易。

金敬迈：我再举个意思。年限划得前一点吧，划到文化大革命，或者划到我从牢里出来为止，我所接触到的领导人，这样就明白了，都赶不上我当年在大街上擦皮鞋那一批穷朋友。论品德，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我那些满脸黑漆漆，流着鼻涕，又脏又臭的“小流氓”，没有人能跟他们比。就算当年那些“小流氓”打我，把我打得头破血流也好，一听说我擦皮鞋是为了抓药给我妹妹治病（因为那时我妹病得快死了），所有的人都把钱掏出来给我，“金娃子，你先用，你狗日的不拿走老子今天就不饶你。”虽然骂着脏话，但是有人性，同情人。但是，一些恶劣的政治家、政治流氓，都是人性丑恶。

田炳信：其实你也压根没想去做官，以你的脾气这么桀骜不驯呢，不服管的性格，不是当官的料。你也没有作这个准备，你糊里糊涂地上去了，又糊里糊涂地关起来了，然后又不清不楚地给放出来了。

金敬迈：不，应该说我是坐牢坐聪明了。

田炳信：坐牢坐醒了，你说过“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但现在我醒了。”

金敬迈：对，我是坐牢坐醒了。你像开除刘少奇出党，不可怕，一个人错了不可怕，但全党都同意，这才可怕。所有人都错了，才可怕。这个太可怕了，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搞这个。现在还搞不搞，还很难说，而且，全国13亿人，居然还容忍，这才是更可怕，简直是恐怖了。这也是我活得生不逢时。

田炳信：但你活得很精彩啊，你就像个宽带网，高的，低的，都经历了。以前你是写别人的故事，面现在是写自己的故事，被别人写了。所以我认为你要写的那几本书，《天堂》、《地狱》、《人间》，应该改名为《假》、《恶》、《丑》，这样可能会更扣题。

金敬迈：我一定认真考虑。

有两个寓言可以解释金敬迈的两个极点。

有一天，上帝召集了所有的动物聚在一起吃饭，然后取出了一双笨重的翅膀赐给各位。动物们在看了翅膀一眼后，纷纷回到座位上。最后，一只小鸟走过来，心想，上帝不会亏待动物们，所以这个看起来笨重的东西，或许是一种恩赐。于是，小鸟背在背上试着挥动翅膀，没想到飞上了天，许多动物目睹此景，心中后悔也来不及了。金敬迈曾是一只这样的小鸟，一夜之间红遍中国。

还有一个寓言，讲的也是一只小鸟要飞到南方去过冬。天太冷，小鸟被冻僵了，于是它飞到一大块空地上。一头牛经过，拉了一堆牛粪在小鸟身上。冻僵的小鸟躺在粪堆里，觉得好温暖，渐渐苏醒过来。它温暖而快活地躺着，开始唱起歌来。一只路过的猫听到歌声，很快便发现了粪堆里的小鸟，把它拽出来吃掉了。金敬迈也曾是这样一只小鸟，不清不楚，被政治蒸发掉了。大喜大悲，大红大紫，大起大落，大南大北，大福大难。谁也说不清，看不透。生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寓言是一种象征。短，明白，通透。短，一根针能串起一群人，一代人。明白像一口井，你探头探脑就能照见你自己的模样。通透，像一弯明月，夜幕下的颜色差不了多少。

（全文完）

□ 来源：《南方网》

~~~~~

【研究动态】

麦克法夸尔的文革世界

• 丁学良 •

本月29日，哈佛大学讲座教授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中文雅名为马若德）应邀来香港，为他的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中译本首发，在中文大学行政楼祖尧堂作专题报告。这场报告会的最佳地点应该是毛泽东曾指挥文革的首都北京，第二佳地点应该是薄熙来曾唱红打黑的雾都重庆，可惜这两地都开办不成，只好在第三佳地点香港举办——香港虽然不是中国文革的中心城市，却早已经是全球文革研究成果出版发行的最大中心。位于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收集有汗牛充栋的文革第一手材料，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文革学者都得来这里苦读苦抄苦思苦撰。

麦克法夸尔出身于英国贵族世家，可年轻时热衷于社会公平的政治潮流，加入了属于左翼的工党，成为议会下院议员。他一度供职于英国外交部，以高级文官身份于1971年首次访华。前此他还担任过BBC国际新闻节目的主持人，并且参与创办了后来享誉全球学界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在政界、传媒界、学界均积累了亲身奋斗的丰富经验。当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国重新推向世界的时候，西方研究中国的重镇哈佛大学就把麦克法夸尔请回去，执掌当代中国政治的教学和研究。他早年在此校跟随西方的中国史学大师费正清读研究生，回到母校，心甘情愿。况且他在这里读书的年代，又幸遇研究中国问题的才女爱茉莉（日后任《经济学人》杂志的波士顿站长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国际版主编），结成良缘。

麦克法夸尔最早的研究领域其实是国际关系，成名作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磨擦冲突，以及1949年以后中国和美国的麻烦关系。然而，有着亲身从政经验的他，对政治大趋势的敏感度非一般的书呆子可比拟。中国文革一启动，他就感觉到此一事件非同寻常，于是从1968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课题，由此而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文革的领军人物。1974年，他发表了“文革前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年》；1983年，他发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至1960年的大跃进；1997年，第三卷发行，剖析中共领导层在1961至1966年期间的严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史”的英文版，加起来将近一千七百万字，密密麻麻的排字本，真正是让人望而生畏、叹为观止！它们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1999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殊荣。这位于1969年不幸英年早逝的Levenson生前在西方被认为是当代最有才华的治中国史的杰出学者之一，他的代表作，是探讨中国现代化之文化价值观困境的三卷本巨著：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以他命名的这项学术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麦克法夸尔不但以著作获得Levenson奖，他在哈佛大学还获得过Levenson杰出教学奖，可谓双奖一身，名至实归。

中国内地对于麦克法夸尔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视，北京的《求实出版社》于1989至1990年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译本，首印发行量共十一万册，盗版则难以计数。麦克法夸尔贵族世家出身，对钱财不怎么在乎，一分钱稿酬版税也没有索取，只希望他的文革研究成果能够被深受文革之苦的中国人民广泛阅读。可惜1989年“六四”之后，中国内地的言论空间急速压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译本的第三卷（副标题是“浩劫的来临：1961—1966年”）一直难以问世。幸亏还有个香港，于是就有了本月29日第三卷的首发及报告会。新世纪出版社同时还修订了第一卷、第二卷的译本，把被内地出版社砍掉的部份补足。三卷齐发，以满足各地中文读者的渴求。

华人社会里有句流传极广的悲怆之言：“文革虽是发生在中国，文革研究却是在海外”。西方世界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麦克法夸尔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工作。远在1980年代的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他提议，可否在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专讲“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

的研究型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到那时为止，虽然西方大学其他的课程中也有中国文革的内容，但都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份讲授的。

虽然这个建议对麦克法夸尔颇具诱惑力，但他却心中无底——中国的文革是那么的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怎么好给美国本土生、本土长的大孩子们讲清楚呢？比如说吧，毛泽东正式发动文革的头排猛烈炮火——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海瑞被罢官的时代是16世纪中叶，那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了两个多世纪。怎么能够对美国的本科生讲明白，在毛泽东的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都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小仆人呢？

谁知道首届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注册号码是“外国文化48”）于1988年春季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几达千名。哈佛本科生院全部学生才只有六千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校方后勤部门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校园里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我们接受博士学位证书的仪式便是在那里面举行的。

我记得正式注册修首届中国文革课的学生是830名左右，仅助教队伍就有22名，包括本人在内。这次从美国、欧洲、北京、蒙古等地赶来香港参加29日报告会的，有好几位都是当年的助教或学生。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的美国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按此标准，香港的“走资派”实在太多了！

麦克法夸尔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文革迄今二十余年，这门课已经成为哈佛的经典课程之一。后来的学生更幸运，因为他们有了一部专著当课本，这便是麦克法夸尔与瑞典籍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功力深厚的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合作，劳作经年完成的巨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几近700页的英文原版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发行，中文译本三年后问世（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均受到西中学界的高度评价。

不过，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似乎并不带来财运。自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文版问世后，访问哈佛大学的中国政界和学界重要人士，只要有机会面晤麦克法夸尔，都会向先生索取该书。麦克法夸尔自己掏腰包，多次请人从香港购书空邮。随着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译本出齐，麦克法夸尔的送书支出又要上升一个新台阶。

经常阅读英文报刊的人或许会注意到，今年初“王立军—薄熙来事变”以来，麦克法夸尔就成为国际主要媒体采访最多的西方资深学者。倒不是他与重庆有甚么特殊关系，而是因为他的文革研究为解读重庆事变提供了最贴切的背景和深层脉络。薄、王那一帮领导干部利用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舆论制约、更不受道德制约的黑帮式权力，为别人造就了一片红色恐怖，同时也为自己埋设了一串烈性炸药。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爆——爆炸是一定的，爆炸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则是不一定的。于是，从第一声锣鼓报幕起始，全世界的观察家们就在等着看好戏。读过麦克法夸尔有关文革研究多部著作的人们应该有所意识：这台戏还没有演完，大家还得熬点夜，说不准就在我犯困不已、呵欠连天、上床便倒头酣睡的那一刻，挺精采的一出戏又上演了。

半个多世纪之前，麦克法夸尔的老师一辈就对他们这些刚入门的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研究生说：你们选择了这个专业，以后几十年可就有苦活干了。语言难学、资料难找、关系难建、

论文难发、著作难写，等等等等。不过也有诱人的回报：你把中国政治梳理好几遍了，有点不耐烦了，突然一切都变了个样，认不出来了，于是又磨拳擦掌去探索刚涌现的神秘和新奇。所以，研究中国政治是永远不会乏味的。

四分之一世纪之前，麦克法夸尔对我们也说过类似的话。如今，我对来自西方东方的学生们讲着相同的话。

□ 来源：《FT 中文网》2012年10月15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